

人论二十五种

刘再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论二十五种 / 刘再复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086-2479-2

I. 人… II. 刘… III. 民族性-研究-中国 IV. C9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3413 号

人论二十五种

RENLUN ERSHIWU ZHONG

著 者: 刘再复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9 层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6-2479-2/1 · 167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http://www.publish.citic.com>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服务热线: 010-84849283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前言

我的著作多数太“重”，太严肃，《人论二十五种》此书则很“轻”，至少可以说是“以轻驭重”，以嬉笑取代歌哭。因为自己觉得“别具一格”，就想让国内的朋友也看看笑笑。此书写于出国后的第三年和第四年，即1991年和1992年。那时我已结束了内心的“窒息感”，从苦闷中跳出。很奇怪，身心一放松，“幽默”也随之产生，《人论二十五种》正好补充了我论著中“轻”（幽默）的阙如。

此书初版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制作和推出，这一出版社一向只出英文著作，《人论二十五种》算是它的第一部中文书籍，这要感谢林道群兄的“破格选拔”。书出版后颇受欢迎，半年后就出第二版。李泽厚兄读后（1993年）评价说：“这是你最有特色的一本书。”有朋友肯定，我就更自珍自惜了。

但是此书毕竟写于出国初期，当时虽然已调节了一些心理“倾斜”，但还没有完全放下激愤情绪，“轻”中还是带“刺”，这与我近年来的“从容”笔触有所不同，现在此书在国内出版，我担心会无意中伤及他人。倘若有读者感觉不对，请多鉴谅。好在我的各论都是“对事不对人”，没有具体指涉对象，换句话说，这是“精神现象”批评，不是“人身抨击”之书。幽默的特点本就没有攻击性与侵略性，只是为了让自己解脱也让读者轻松一些而已。

刘再复

2010年11月初于美国

国无人（自序）

屈原在《离骚》的末段中云：

乱曰：
已矣哉，
国无人——
莫我知兮，
又何怀乎故都？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
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屈原在这首卓绝千古的长诗中最后感慨“国无人”，说的是国中没有贤者、识者能与他的心灵相通。这自然不是说国中没有普通意义上的人，而是说国中没有杰出人才。举国无人，这是多么深的感慨！屈原已感到楚国大厦将崩，能够支撑“美政”的精华，死的死，走的走，有的被囚禁，有的被杀害，连他也被放逐，国中真是没有人才了。一个朝代灭亡之前，总是要为自己扫清通向坟墓的道路，而这种清扫，就是扫除自己的精英。

中国是个人治的国家，国中无人才，变成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古学者早已论断：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人与政的关系极大。中国历来的家政国政主持者最担心的就是能否“得人”，是否有像样的“接班人”。他们最忧虑的就是“断

后”，即“后继无人”。我写过一篇短文叫做《贾府的断后现象》，正是说昌盛一时的贾府最后走向衰败，并不在于它被“抄检”，而在于它的“断后”。“抄检”固然伤了元气，但是，只要有人，还可以重整乾坤。遗憾的是，到了宝玉这一代，府中已无人矣。以荣国府而论，府中多半是一些美丽而无治家之才的女子；男子中本可以支撑局面的贾珠偏偏夭折，唯一可用的贾琏又“腐化堕落”，忙于寻花问柳，而宝玉虽有好性情却无好本事，剩下的贾环则是“劣种”，属妄人和末人。最后可算“好苗子”的贾兰，虽还努力，但年轻轻就成了套中人，讲的是一派“酸论”，能否成才还是个问题。对于贾府的“断后”现象，王熙凤最敏感地意识到。她早就看到贾府上下个个不中用，难成大气候。《红楼梦》第五十五回中，她在平儿面前分析了荣国府中的人说：

我正愁没个膀臂。虽有个宝玉，他又不是这里头的货，纵收伏了他也不中用。大奶奶是个佛爷，也不中用。二姑娘更不中用，亦且不是这屋里的人。四姑娘小呢。兰小子更小。环儿更是个燎毛的小冻猫子，只等有热灶火坑让他钻去罢。……再者林丫头和宝姑娘他两个倒好，偏又都是亲戚，又不好管咱家务事。况且一个是美人灯儿，风吹吹就坏了；一个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也难十分去问他。倒只剩了三姑娘一个……

在贾府中，王熙凤算是一个猛人。平儿虽是她的知己，但不是她的帮凶，本可能堕落成为虎作伥的“伥人”，却偏偏成了对一切都好的贤人。王熙凤在知己面前，清醒地分析了贾府的人才危机，看到人虽多而不中用的问题，看得真是透彻。

这种“断后”现象，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也很严重。常听到人们嘲笑八九十岁高龄的老人继续操劳国政，而我却未曾抨击此事，因为这实在是无可奈何，“后人”多半不太中用。这不是说中国没有人才，而是人才被历次的政治运动扫荡得差不多了。现在还能称得上人才的，往往是扫灭之后又恢复了名誉的幸存者。而这些幸存者，锋芒尚在的也有，但多数成了被阉割掉肝胆的阉人，或被吞没了真性情的笼中人和套中人。而新产生的年青精英，因生长的人文环境不好，身在故乡却有如异乡人，而一旦出国深造，则准备长期扎营海外。所以在异邦看到中国人才济济（仅美国，就可称为中国的人才库），而在故土中却看到人才空空荡荡，特别是能延续民族生机的“栋梁之才”。

说“国无人”，是说国中少有杰出之才，而像贾环这种“冻猫子”，倒是很多很多的。我写《人论二十五种》正是感慨中国一面少有杰出人才，一面却繁殖了大量的特殊人种，如傀儡人、阉人、肉人、巧人、酸人、畜人、伥人、谗人等，这些人面目虽不同，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奴性十足，均属奴人，自然也常常转化为奴人的总管或分管。大陆 20 世纪下半叶的情况大约是 80 年代较好，80 年代之前的 30 年中，阶级斗争太偏激，政治运动太频繁，这些政治运动强迫知识者洗心革面，其结果是把人才变成奴才，即阉割其锐气才气，注入奴气，把他们改造为“驯服工具”。到了 80 年代末，因风云变幻，人才再次被扫荡，国又无人，此时，唯一的办法，是重用奴才，把奴才当做人才甚至旗帜，这样，原先的“把人才变成奴才”的公式此时就变成“把奴才当做人才”的公式。所谓“国无人”，绝不是指国中没有奴才这种人。

我所描写的肉人、伥人、谗人种种，其实是“古已有之”，

中国的智者和异国的智者早已给他们命了名。所以，我所描写这些人，并非杜撰。但是，在新时代中他们都有了新的内涵，而且种种人性均有发展。所以，我在描述这些人的“社会相”时，尽可能把它的新面貌勾勒出来。当然，其中也有我给予命名的，如酸人，但也不是杜撰，倘若不是讴歌文学太盛，诗中的酸味太重，故作小儿态的人事太多，我是决不会想到这个美名的。

我对孕育我自身的人类永远不会失去信念。但是，我对近年来大陆的许多类型的人感到绝望，觉得从上到下，畸形人太多，也可以说是病态、变态的人格太多。“五四”运动时，文化先觉者们曾高扬人的旗帜，揭露和描述病态的社会与病态的人格，所以才有阿 Q 这种畸形儿文学形象的产生。没想到，社会发展到 20 世纪下半叶，这种畸形儿，反而大量繁衍，韩少功、残雪笔下就写了好些畸形儿。我不是小说家，只能用另一种文字形式来叙述，也给畸形儿们留个记录。在记录与思索中，我感到更可怕的是，阿 Q 在他那个时代还是一个平民百姓，其畸形性格还不足以摆布社会。可是到了下半世纪，阿 Q 翻身，各种畸形人成了社会的管理主体，傀儡人垄断傀儡戏；点头人成了领头人；交白卷的末人成了举红旗的先锋；无赖成了指路明灯；佞人成了坚定的革命战士；酸人成了诗人；妄人成了思想解放的前卫分子。这些情况使社会优劣不分，并且使人感到，在自然界固然常常是“优胜劣败”，而在社会界，似乎正相反：常常是“优败劣胜”。这种退化现象使社会丧魂落魄，一时六神无主。我写《人论二十五种》，除了感慨“国无人”之外，还感慨“国无魂”。

虽然《人论二十五种》写的主要是人的荒谬和人的病态，对人开始绝望，但我仍然在反抗荒谬，反抗绝望。我确信人生

的意义正存在于反抗荒谬与反抗绝望之中。我写“末人”，自然是希望教育机器不要再制造末人；我写肉人，是希望社会不要再掏空人的精神，或要求心灵的国有化；我写傀儡人，更是为社会呼唤新鲜的、活泼的、属于自己的灵魂。我还特别写了怪人论、痴人论、逸人论和论隙缝人等，为这些人辩护，为人的个性辩论，为人的执著性辩论，为人的自由权利辩护，并呼吁给人的自由意志以存身之所。倘若不允许“怪人”存在，一有个性就加以扑灭，有点特异的思想，就兴师动众地加以批判，一点隙缝也不给，连隐逸之所、避难之所也都捣毁，政治乌云笼罩一切，那还能有人才的孕育之地吗？

我写的这些人，侧重于展示中国的社会相，但它又不只是属于中国。其中的许多低劣人种，其实是人类普遍的人性恶的表现，可以说是跨文化的现象。东方有酸人，西方也有酸人，只是酸味不大一样；东方有肉人，西方也有肉人，而且肉人发达的盛况绝对不在东方之下。只要有钱，正如可买到肉猪、肉牛、肉羊一样也可以找到肉人。到处都有肉人的市场，恰恰是西方社会危机的一种征兆。中国有套中人，西方更是早已有之，套中人的概念本来就是俄国契诃夫的概念。末人、犬儒人、点头人等概念也是来自域外。我描写这些人种固然是对中国“无人”的感慨，也是对人类社会精神可能退化的担忧，并未陷入中国的政治视角。我用的倒是审美的视角。因此，描述的主要不是人性之恶，而是人性之丑。我以自己审丑的结果，奉献给干净的孩子们和尚未被社会污染的纯洁心灵，愿他们与种种病态人格保持精神距离，让自己的人生具有别一种境界。

《人论二十五种》在《明报月刊》发表了一部分之后，传到国内，许多心情忧郁的朋友赢得一笑，他们笑后写信给我说，没想到你这两三年倒幽默起来了，而且不是化凶残为一笑。确

乎如此，到国外，我确实轻得多，已从“重人”慢慢变为“轻人”，但在轻松背后仍然有负重与期待。不过，能让朋友高兴高兴就好。当然，另有些人读了自然很不高兴，说我含沙射影，太刺激了。我应当承认，写作时，我自然想到一些具体人，如写酸人时，自然想到故作小儿态而放声歌唱的诗人；写到侘人、畜人、谗人时，也闪过正凶恶地批判和诽谤我的论客，但只是“一闪念”而已，绝没有时间去理会他们，更不会被他们的面目所限。我写的乃是人类的普遍现象，即人类不成熟时的不幸现象，也就是说，我超越了我的憎恶。我的眼珠正遨游于四海之间，自然不会老转到那些并不美丽的嘴脸上去。

目 录

Ⅲ 前言

Ⅳ 国无人（自序）

1 论傀儡人

9 论套中人

18 论犬儒人

27 论点头人

35 论媚俗人

42 肉人论

52 猛人论

59 末人论

69 轻人论

77	酸人论
83	阉人论
91	忍人论
100	佞人论
109	妄人论
116	阴人论
124	巧人论
132	屠人论
141	畜人论
151	谗人论
161	俭人论
169	痴人论
177	怪人论
186	逸人论
194	论分裂人
204	论隙缝人
211	后记
213	直面自身（再版后记）

论傀儡人

中国很早就有傀儡戏，也叫做木偶戏。我的家乡福建闽南一带，至今还有木偶戏，而且常常出洋演出，为国争光。我自己非常喜欢傀儡戏，小时候曾操着小刀，想制造几个傀儡，然而，不但没有成功，还险些削掉自己的小指头。

大约由于童年的经历，长大后总是特别关注傀儡戏。恰巧我工作的文学研究所，有一位著名的老学者孙楷第，就是研究傀儡戏的专家，他所作的《傀儡戏考原》、《近代戏曲的唱演形式出自傀儡戏影戏考》、《傀儡戏影戏补载》等，都是我很喜欢读的学术论文。

从孙先生的论文中，我不仅了解了傀儡戏，而且了解了傀儡人。未读这些论文之前，我以为傀儡戏即木偶戏，傀儡人即木偶人，读了之后才知道，这也是简单化。其实，傀儡的种类

很多，有杖头傀儡、悬丝傀儡、药发傀儡、水傀儡、肉傀儡等，真正具有傀儡人资格的，乃是肉傀儡。现在还流行的木偶戏中的木偶人，属木傀儡，它虽有人形，但不是人，还算不得傀儡人。按照孙先生的标准，我故乡那些为国争光的木偶，可能就不够不上傀儡人的资格。

孙先生是一个执著的学者，他在论证宋元以来之戏文杂剧乃是出自末代的傀儡戏与大影戏时，对傀儡戏的发展过程做了一番考察，认为傀儡戏经过三个发展段落，第一段落可称为“木偶人”段落，他说：

宋之傀儡戏，其人物初以木偶为之。木偶人不能自动，故须以线提，以杖擎，由艺人耍弄之，使像真人活动之状。木偶人不能自语，故须另有人代之道达宣扬，此傀儡戏之最初形式也。

这种初级阶段的木偶人的特点是不能自动，不能自语，须有人在他的背后牵线和为他说话。第二阶段则是“小儿傀儡”阶段，这是以儿童代替木头，以肉傀儡代替木傀儡，此乃是傀儡戏的一大变革。孙先生说：

其后改为肉傀儡，其傀儡以小儿（现代汉语称为儿童——引者注）为之。此时艺人所擎者为真人而非本人，固已近乎后之扮戏矣，然小儿之舞转，仍须地上人为之助，

且不得有语，其赞导者另有之，此为傀儡戏之第一次变化。

这种肉傀儡，不是“木人”，而是儿童，算是一大进步。但是，既然是真人（儿童）所扮，为什么还称为傀儡呢？这是因为他仍然带有傀儡的特点，一是“不得有语”，即没有自己的话语；二是不能自立，即必须由他人所托举，受制于后台的“赞导者”。但这种“小儿”是真人，所以孙先生称之为“肉傀儡”，也就是初等傀儡人。

我是很佩服这种“小儿傀儡”的，他们明明是真人活人，却不得说话。不得说本来也罢，他们却又得摆着说话的样子，以传达贯彻操作者的精神。咱们设身处地想想，这种肉傀儡是多么辛苦啊。如果请现代的很娇气的儿童来扮演这种角色，他们恐怕是不会干的。

根据孙先生的考证，这种“小儿傀儡”只能算是初等傀儡人，这之后，傀儡戏又发生了第二次大的变革，即以“后生”代替“小儿”，也就是以少年代替儿童。这种“后生”不仅形象比“小儿”高大，而且“动作由己，不须人擎”。但他所以仍然是傀儡人，据孙先生说，关键还是他“仍不得有言”，而且仍然是“其赞导者另以他人司之”。也就是说，这种“后生傀儡”虽有成人样，也有自己的行为动作，但仍然具有傀儡的两个根本特征，即不会说自己的话和受制于背后的“他人”，用孙先生的话说，就是“仍遵守不言之律”和“以赞导之事付

之人”。

傀儡戏再往前发展，便进入最后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后生成熟了，既会动作又会说话，突破“不言之律”，“动作言语皆由己出”，这与后来的“扮戏”很相似，但是，因为扮者虽然会说话，但不会说属于自己的话，只能说赞导者的话，类似现代的传声筒，“所言者就是赞导之词，所歌者就是傀儡儿词”，所以仍属傀儡戏范围。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傀儡戏已接近戏剧，而傀儡人因为能动能言而成了高等傀儡人了。在表面上，高等傀儡人和真正的人已没有差别，但在深层的精神面上，他们与真正的人仍有巨大的区别，这就是它没有人之所以成为人所必需的独立人格和表现这种人格的属于自身的语言，即虽会说话，但不会说属于自己的话。综上所述，我们便可以知道所谓傀儡人，乃是被他人所操纵所掌握而没有自己的灵魂和没有自己的话语的人。

傀儡人，本来是戏台上的人。但中国近代的思想家们却发现当时中国的土地上，从上到下，到处都是傀儡人：君系傀儡君，臣系傀儡臣，民系傀儡民。由于组成国家共同体的细胞都是傀儡，所以国也就成了傀儡国。发现这一现象，并给予揭露的，首先是梁启超。

梁启超办《清议报》时，曾以“哀时客”的笔名，发表了《傀儡说》（1899年3月22日），哀叹中国已经傀儡化——“傀儡其君，傀儡其吏，傀儡其国”，即从皇帝到平民全成了傀儡。

当时光绪皇帝是慈禧太后的傀儡，而官吏和人民又是爱新觉罗王族的傀儡官吏和傀儡百姓。

梁启超所道破的近代中国的一个重大社会现象，就是国家失去灵魂，国君失去灵魂，国吏失去灵魂，国民失去灵魂，从光绪到平民全都成了无魂之物，都不会说自己的话。对于这种普遍性的傀儡现象的强烈感受，是当时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所以，当梁启超及时地说出来之后，留学生们和改革者们都恍然大悟，大声疾呼要拯救将死的国魂和将死的民魂，改变国君、国吏、国民乃至国家的傀儡形象。当时《浙江潮》创刊号的开篇，就叫做《国魂篇》。此文认为，要招国魂，首先就是不能当傀儡人。他们说：“五官具，四肢备。圆其颅，方其趾。则谓之为人矣乎？而或者，是非人也。傀儡也。何以故？曰无魂故，是以戮之斩之勿知痛。”他们的意思是说，傀儡虽有人的四肢五官，但没有人的灵魂，要救人救国，首先要改变傀儡人的形象。

梁启超和其他志士们的这些鞭挞“傀儡”的文章，最使我难忘的是他们的自审精神。他们认为，当时中国之所以会傀儡化，并不是某一个人（如慈禧太后）的责任。慈禧固然把光绪变成她的傀儡皇帝，使大臣们也成了傀儡大臣，但是，如果从皇帝到老百姓都有自己的灵魂，都能自立、自爱、自尊、自言，敢说自己想说的话，敢维护自己的人格，清末的傀儡系统能够成立吗？慈禧太后这位老太太能有足够的力量操纵数亿有独立

人格的臣民吗？所以梁启超说：“中国者，傀儡之颀而硕者也，一人之力不足以举之，则相率共傀儡之。”他十分感慨地说，由于大家“相率共傀儡之”而不自知，或自知而不自愧自省，所以中国最后变成一个巨大的布满傀儡人的傀儡场，亿万官民都在表演被他者所掌握的傀儡戏，真是悲惨之极！梁启超悲愤地说：

嗟呼！必自傀儡，然后人傀儡之。中国之傀儡固已久矣，乃今不思自救，犹复傀儡其君，傀儡其民，竭忠尽谋，为他人效死力，于是，我二万方里之地，竟将为一大傀儡场矣。

梁启超所说的“必自傀儡，然后人傀儡之”，是很有道理的。清代所以会形成那样一种自上而下的大傀儡场，实在是每个国民都为这个傀儡场提供了一个细胞，一种条件，一块基石。所以要摆脱傀儡地位，最要紧的乃是要以每一个人的自省为起点，不再做傀儡人，这样，傀儡的赞导者就不能随意摆布，为所欲为。梁启超这种精神，正是我国这代人的一种非常宝贵的忧国忏悔精神。

这种自审自救的精神，近现代的思想家们，如陈独秀、鲁迅等，都以各种不同的文化形式表达过，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了。而有一本直接以忏悔充当傀儡人为主旨的《忏悔录》，则鲜为人知。这就是出版于1920年的黄远生先生所作的《远生